

Doi: 10.20063/j.cnki.CN37-1452/C.2026.02.005

义理与心性的纠葛： 明中后期唐宋八大家古文评点者的批评理念

王甜甜

兰州大学 文学院, 兰州 730000

摘要:古文评点体现着评家的古文思想。嘉靖、万历时期,古文选本多由地方官员为课士而编,从弘道和文章法度的角度来点评唐宋八大家古文,这是承袭南宋理学家评点而来,同时更注重阐述评家意图,传递理道观念。随着阳明心学的兴起,唐顺之“本色论”和公安派“性灵说”等文学思想在明中后期文坛兴盛,评点倾向于对八大家古文心性和情感的发掘。书坊在编刊古文选本时常将“义理”与“心性”两类评点汇集,形成“集评”现象,以增加售卖点和射利。义理和心性两类评点理念在明中后期唐宋八大家古文选本中的并存,既能够反映明中后期文人多元的古文思想,又是举业用书商业化的体现。

关键词:明中后期;科考;唐宋八大家古文评点;义理;心性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6)02-0041-07

明中后期,唐宋八大家古文评点者的批评理念既有对儒家道统的阐释和宋代“程朱理学”思潮的承继,以维护古文“载道”的义理传统;又受到本朝“阳明心学”思潮中“求诸本心”的启发,评点者试图在文本细读中注入个体化的审美体验和心性追求,从而呈现出义理与心性的纠葛状态。这种复杂的评点理念在明中后期唐宋八大家古文集评本中体现得尤为显著。“集评”现象产生于明中后期,被视作评点文学全面繁荣的重要标志之一^{[1]109}。长期以来,学界主要关注“集评”的表现形式、发生机制和集评本的文本优势与传播价值^[2],很少仔细分析集评本中所收录的评语情况。诚然,集评本的出现与明中后期商业出版的繁荣密不可分,带有浓厚的商业色彩,出版商也多出于牟利目的汇集名家评点。但是整体考察明中后期专选或选辑有唐宋八大家古文的集评本,会发现很多集评本并不是不加选择地汇集众家评语,而是有着思想文化因素的考量,这种考量是明中后期特定的学术思潮的反映。

一、法度与义理:对宋代理学家选评思想的承继

明中后期专选或选辑有唐宋八大家古文的八

十多部集评本或多或少因袭宋代评语,评语因袭对象集中于吕祖谦《古文关键》、谢枋得《文章轨范》、楼昉《崇古文诀》、真德秀《文章正宗》等宋代理学家编撰的评点本。明末编刊的古文集评本商业属性突出,辑录宋代评家评语更多是为了求全、求名,以满足书籍宣传的需要。相较而言,嘉靖至万历前期的古文集评本多由地方官员编次和梓行,带有服务地方课士的目的,如王三省《古文类选》、胡汝嘉《文章正宗钞》、敖鲲《古文崇正》、刘祐《文章正论》、金学曾《文章正宗选钞》等。这些具有官刻性质的古文集评本对宋代评语的大量辑录,主要集中于法度和义理两个方面,亦能反映出对宋代理学家评点思想的承袭。

南宋评家对唐宋八大家古文点评的主要倾向之一是对文章写作法度的探讨,《古文关键》《崇古文诀》《文章轨范》等选评本中多是此类评点。这种文法类评点在明中后期受到了追捧。《古文类选》《文章正宗钞》《古文崇正》等明中后期集评本大量征引吕祖谦、楼昉、谢枋得等南宋评家评语,以求得对古文立意、结构、遣词、造句等文法类知识的全面把握。在承袭南宋评语的同时,明中后期士人还会分析南宋选评本中选评者的选评意图,并提出自己的看法,例如《文章正宗钞》编者

收稿日期:2025-04-01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专项项目“古典诗教文道传统的当代阐释及教育实践”(2024JZDZ049)

作者简介:王甜甜(1994—),女,河南平舆人,兰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胡汝嘉在欧阳修《朋党论》和《上范司谏书》选文后评道:

以上二篇,俱系迭山先生批点。大抵先生取文在波澜闪烁者,而不喜平淡漫衍者,故所论于韩、欧者如此。然文自有体,如水之流,长江大河,一泻千里,终日无声;至于风鼓之而浪,石触之而波,偶然之遇耳。无风无石,汪汪万顷,未为非美观也。先生非不知此,特欲开发初学,鼓动其精神,发舒其才藻,故《轨范》所取皆存此意,而曾、王之作俱不入选。第学者专攻为此,则未免喧呶震掉,而反累于和平之体,此又不可不知也。^[3]卷4:11a

胡汝嘉从谢枋得《文章轨范》中的韩、欧选文看出他比较重视“波澜闪烁”之文,目的是“欲开发初学,鼓动其精神,发舒其才藻”,点明了《轨范》服务士子举业的编刊意图。胡汝嘉还以“水流”喻文,认为各类文体皆有美观,彰显了他通达的文章观。因此他批评《轨范》不选曾、王文,影响了士子对“和平之体”的学习。曾巩文和王安石文以谨严、平实的行文法度著称,其中曾巩文散发出浓厚的文道并重的文学观和儒家济世思想,王安石文对儒家经典的征引和“以议论行叙事”的写作模式被吕祖谦、朱熹、楼昉、袁褰、陈宗礼、茅坤、唐顺之等宋明文人所解读和认可。可见,胡汝嘉对宋代理学家的选评思想是一种批判性承继。

借助古文文统来延续儒家道统,是南宋理学家编选古文选评本的一个重要原因。《古文关键》《崇古文诀》《文章轨范》均是着重于点评文章的创作技巧,但这并不能说明编选者吕祖谦、楼昉、谢枋得对“文”“道”关系的疏离。以吕祖谦为例,编选《古文关键》只是其文统观的一个体现。他作为一名理学家,具有强烈的道统意识。《丽泽论说集录》集中记录了吕祖谦的讲学之语,吕氏的儒道思想时常出现。在卷六“门人集录论语说”中,吕祖谦先指出“‘为仁’,见学者用力处”,认为“‘弟子入则孝’章,大抵言学者当务本,文艺亦所当为,盖无此非学也,然当以立本为先。”后又言“‘亲仁’,所以辅成吾德。‘亲’者,心诚亲之之谓。”^[4]¹⁵⁴吕祖谦在此强调学者为学应当先践行仁道,将文学与儒家的仁道思想勾连起来。在卷十“门人所记杂说二”中,吕祖谦又指出“初学欲求义理,且看上蔡《语》《闾范》《伊川易》,研究推

索,自有所见”,并道出了研求义理之途径“持养,体察,主敬,致知,观过”^[4]²⁵⁴。这些都是宋代理学家遵循的道德修养方法,诸家多有论及,诸如朱熹曾言“主敬者存心之要,致知者进学之功”^[5]⁸¹等。这表明吕祖谦也旨在探求义理,涵养本心,以滋养文章的写作,流露出“文以贯道”的文学观。

周应龙《文髓》、署名教斋《古文标准》和《新编诸儒批点古今文章正印》等晚宋评点本对吕祖谦、楼昉、谢枋得、真德秀等人的评语多有辑录或删除,可见重视作文法度是南宋选评本一以贯之的理念。同时这三部评点本也出现了新变,即注重传递理道观念。《文髓》为绍定进士周应龙选评,今见藏于江西省图书馆,明宣德三年(1428年)周歧凤刻本,最大特点是推重苏轼之文,并且在对苏文的点评中认为苏轼为人能坚守儒道和为文能够传达正确的儒家伦理道德观念,如从圣人行君道的角度对《孔子从先进》一文点评道:“以‘始进以正’立说,议论正大。”^[6]卷九:4b 通览《文髓》中唐宋文评点,多为传授写作技巧,强调儒道的点评仅占少数,但它突破了南宋古文选评本中仅因科考需要学习苏文的狭隘视域,将古文之学的传授推到儒道思想层面。《古文标准》为南宋佚书,侯体健^[7]、李由^[8]分别从王霆震编选《诸儒批点古文集成前集》和宋咸淳年间刘震孙编选《新编诸儒批点古今文章正印》中辑得《古文标准》选文30篇。与其前后出现的南宋选评本不同,《古文标准》收录有周敦颐和朱熹两位理学家文章和受到朱熹推崇的司马光的两篇文章,教斋还在周敦颐《爱莲说》的点评中称周敦颐为“道学宗师”,评价甚高。对此,李由进行了高屋建瓴的总结:“《古文标准》体现了南宋后期理学逐渐官方化的历史背景下,理学之士对于‘古文标准’的重构:既重唐宋古文创作的历史统绪,又重道学统绪,并将古文评点之学与程朱性理之学相结合,从文章学与理学的双重视角肯定理学家之文,将其纳入古文典范之列。此举迎合了南宋中后期士人弥合理学与文学分裂的思潮,促进了理学文章的文学经典化,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8]

二、“本色论”与“真精神”:唐顺之的古文法度观与评点倾向

“将本色论与性灵说结合起来,这是阳明心学对晚明文坛的最大贡献。”^[9]²⁸³“本色论”是唐宋派文人唐顺之在与茅坤关于文辞创作价值的辩

论中提出的一个重要的文学理论，集中体现在《答茅鹿门知县二》一文中。此文作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即是唐顺之三十九岁时，正值他由理学到心学的转变期，他在此文中详细阐述了“本色论”的内涵：

至于中一段精神命脉骨髓，则非洗涤心源、独立物表、具古今只眼者，不足以与此……索其所谓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绝无有也，则文虽工，而不免为下格。此文章本色也。^{[10]294-295}

此段文字旨在强调文章要有“精神命脉骨髓”，即能表达出作者的“真精神与千古不可磨灭之见”，此即文章之“本色”。由此可见，唐顺之更为推崇能够发表自己独特见解和真知灼见的文章。唐顺之对文章本色的推崇在其辑评的《文编》中有显著的体现。《文编》成书于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是唐顺之专为指示士子举业所编以讨论文法为主的古文选评本，也是唐顺之接受阳明心学后的产物。他在卷首的“自序”中言：

然则不能无文，而文不能无法。是编者，文之工匠，而法之至也。圣人以神明而达之于文，文士研精于文以窥神明之奥。其窥之也有偏有全，有小有大，有驳有醇，而皆有得也，而神明未尝不在焉。所谓法者，神明之变化也。《易》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学者观之，可以知所谓法矣。^{[10]450}

这里唐顺之主要强调其“文必有法”的文法理论，但是他也指出“法”是“神明之变化”，冀望士人通过研读古文来窥见神明的奥秘。关于“神明”，孙彦认为是“天机”，是一种内化于人心之中的精神、灵明，突出了“心体”的主体性^[11]。唐顺之在对“本色”的阐述中所提到的“洗涤心源、独立物表、具古今只眼”正是要求人们洗净隐蔽天机的欲根，达到超然物外的圣人境界。左东岭称这种境界是“心学家的常用话头”，并认为本色论是从阳明先生那里改头换面而来^{[12]349}。由此可见，“神明”是一种内化于心的精神境界，唐顺之欲借助古文窥探神明之奥秘是由其心学思想品格所驱动的。如此，唐顺之的本色论和其心学思想紧密联系已经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但是在《文编》选文评点中却多是对文章法度的探讨，很少有表达真情实感的点评。唐顺之作为明嘉靖时期的正统士大夫，编选《文编》最主要的目的是指导

士子作文门径，故核心要义就是“法”，此时对具有独到见解、能够表达真知灼见的古文写作技巧的探寻是他点评古文的主要倾向。换言之，“以有法为无法”是唐顺之所追求的文法理论境界。在评点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唐顺之力求摆脱僵化的古文写作格套，强调古文结构的错综变化和自然圆融。如韩愈《送杨少尹序》将杨少尹告老归乡时的低调和汉代疏广、疏受告老归乡时朝野送行的盛况进行比较，称赞杨少尹功成身退、不慕名利的懿行。对此，唐顺之评价这种行文构思“叙得奇”^{[13]卷54:5a}，并指出“前后照应而错综变化不可言”^{[13]卷54:5b}，可见唐顺之极为赞赏此文行文的布局的巧妙。再如唐顺之评价韩愈《答李翱书》：“此文当看抑扬转换处”^{[13]卷48:16b}，评价曾巩《抚州颜鲁公祠堂记》：“叙事议论处，皆以捍贼忤奸分作两项，而混成一片，绝无痕迹，此是可法处”^{[13]卷55:38b}等均是强调文章的布局结构所生发出的曲折变换的艺术效果。关于此，刘尊举从唐顺之古文创作的角度来诠释“真精神”的思想内涵，他指出一方面是对儒家思想的坚守，以及贯彻推行其社会理想的强烈意愿；另一方面是力避陈词滥调、务求真知灼见的构思与写作要求^[14]。无论是古文创作，还是古文评点，它们所反映的唐顺之的文论思想都是一致的，故刘尊举对唐顺之古文与八股文文体互动的研究也可进一步印证唐顺之“以有法为无法”理想的法度观。

姜荣刚通过对“本色”一词在明代语义演进中的考察，指出“本色”论是心学思想影响明代文学理论与创作的最初一环，强调文学自然地表达人的真情实感是明代“本色”论的一个新发展，它是受明代心学影响的直接结果^[15]。因此，可以说唐顺之所追求的“本色”和“以有法为无法”的文论观是明中后期兴起的“性灵说”的最早表现。其实，“神明”或“精神”在唐顺之其他文章中也屡屡出现。如《与顾若溪》言：“窃以六艺之学，皆先王所以寓精神心术之妙，非特以资实用而已。”^{[10]305}《答蔡可泉》言：“自古文人虽其立脚浅浅，然各自有一段精光不可磨灭，开口道得几句千古说不出的说话，是以能与世长久。惟其精神亦尽于言语文字之间，而不暇乎其他，是以谓之文人。”^{[10]312}我们可以看到唐顺之的“精神”更为强调心性本体的自由和自我的舒适。对此，黄卓越指出这已经超越传统儒学规定中的伦理心性，并为各种义理解释或填充所不相容，是一种“生”之

状态下的自然灵明,因此他认为唐顺之的这种“精神”或“神明”可以看做是后来性灵说的一个潜蕴期,同时,它也是心性之学影响文学的首个观念性成果^{[16]222-223}。

后来公安派“性灵说”同样强调真情实感的表达,反对复古模拟和刻意雕琢,主张文学创作要自然天成,尊重个体的独特性和差异性,这都可以看成是对唐顺之“本色论”和“真精神”的承袭。可见唐顺之“本色论”启发了公安派更加注重作者个性的发挥,尊重不同作者的创作风格,从而推动了文学创作的多元发展。概而言之,唐顺之“本色论”开启了明中后期“性灵说”的法门。

三、“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明中后期古文评点的向内探求

“性灵说”是袁宏道在《叙小修诗》中称赞袁中道诗歌时首次提出来的。他言:“大都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笔。”^{[17]187}性灵文学思潮是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和陶望龄、江盈科等“公安派”文人所发起。随着钟惺、谭元春等竟陵派文人以及稍晚的张鼐的加入,性灵文学思潮在明中后期愈发凸显。明中后期士人们对本色和性灵的关注与强调,不仅体现在诗文的创作中,在诗文评点领域亦有广泛体现。由于张鼐辑评有唐宋八大家古文的选评本,且是处于性灵文学思潮晚期的代表人物,故以张鼐选评的《张侗初先生评选古文纲目》为例,挖掘其中评点材料,从而探析明中后期的性灵文学对张鼐评点理念的影响。

《张侗初先生评选古文纲目》八卷,明天启六年(1626年)刻本,张鼐评选,陶嘉祉、陶原煊参订和李元珍校阅,现藏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它是明中后期古文选评本中评点倾向于向内探求的典型。这首先体现在雍丘(今河南杞县)人侯应琛为之所作的《古文纲目序》中,其序言:

文章无古今,其有古今之别者,文人自为之也。其无古今之别者,文心自为之也。其有古今之别,而实无古今之别者,则文章无主而气运有灵者也。故汉以后无文,唐以后无诗,非无文与诗也……今文之不古也,盖亦有说焉:卑今过甚,遁古为佳;有心以拟古,不若无心以合古耳。要当先明其大指。古今作

者,必为之宗,故统必分以正润,而文必辨以衰旺,则纲目不可不讲也。^{[18]卷首}

此序言主要围绕“文章古今之别”展开论证,强调文章的“气脉”是能够跨越时间的存在。文章主乎气运是古人常见的说法,其中“气运”主要指时代的风气运势。具有浓厚气运的文章真切、自然且灵动,既坚守了中国传统儒学强调的“雅正”传统,又强调物对人心的生发促进作用。那么如何才能创作蕴含灵性文脉的文章呢?侯公通过寒暑、温凉、鸿鹄、鲲鹏、阳义、穆满等对比例证,认为“古道有环”“古致有道”“古骨有夸”“古脉有组”,而这些都是可以通过循序渐进的学习实现的,将它们编织在一起,可达到“象成韵”“耀玄珠”和“振灵风”的效果,从而使今文拥有“古心”之内核,这亦是拟古之高境界。那么哪些才是古文之宗?如何辨别对文学有兴旺作用的古文呢?张鼐认为不能忽视“纲目”的导引功用。在《古文纲目》中,张鼐将选文依次分为正人立节之文、劳人经济之文、达人观化之文和才人得意之文。侯应琛对此称赞道:“文章无古今,得其所以为纲为目者,谓有古今亦可,即谓今文亦古。”^{[18]卷首}李元瑛在《叙古文纲目》中言:“纲目之役一以必读者为重,而以有用为令,故以四大文章冠诸首。”又言:“纲在法纪也,其于荣世持世之旨,展卷了然。”^{[18]卷首}二人都指出一个合理的纲目设置能够挖掘今文的“古心”,纲目设置需以读者需求为重,以是否有益于世为重,而《古文纲目》中的纲目设置不仅具有以上特点,在明中后期古文选评本中也颇具独特性。

唐宋八大家的文章集中分在“劳人经济之文”和“达人观化之文”中。先看第二选“劳人经济之文”,李元瑛指出“以经济属第二选者,求实际不尚虚词也”^{[18]卷首},可见此选本比较看重文章的荣世、持世之功和用词的真切可感。诸如苏洵《谏下》主要论述“真能纳谏之君”的问题,文章第三段以三个跳跃渊谷的故事作喻,用“跳而越”“猛虎暴然向逼”“越之如康庄”等词语生动巧妙地论证了勇者、勇怯半者和怯者三种人的进谏表现。张鼐在此文段上眉批:“此下文词似粗,而取喻明切,学者当得之言外。”^{[18]卷4:12a}同时在文末尾评:“评论以明切为贵,文词虽粗,自有一番至理,论以痛快为先,譬喻既醒,何妨一篇腐言。”由此可见,张鼐主要看重此文譬证设喻的技法,故事中的人事和进谏中的各色人物条件相互印证,从而

使得抽象的道理形象化、生动化，读者自然可以体会“贤君需刑赏以开言路”的核心论点。同时，“痛快”一词的使用更是个人情感的尽情流露，是张鼐性灵人学思想的体现。

再看第三选“达人观化之文”。李元瑛言：“至于达人，游泳适情，造化之机，亦复翱翔笔端，所谓知命之学，故属第三选。”^{[18]卷首} 达人即智慧高超、通达知命之人，他们的文章更显顺适作者之性情，契合自然界万物的相生规律，作文运笔时如同展翅飞翔一般自由洒脱。诸如《秋声赋》是欧阳修借“悲秋”来抒发人事忧劳和叹息的辞赋作品，文章写景状物处尤多，层层铺陈渲染，融叙事、议论于一体，是一篇浑然天成的辞赋佳作。张鼐在文末点评道：“形容景物如生，摹写情致活现。”^{[18]卷6:41b} 若细细品味这种直观的图景描绘，会发现其中妙处。文章开头以欧公在灯下静心夜读和室外雨声的淅沥、奔腾以及它与其他物体接触的撞击声等相映衬，呈现出一幅由伏到起、由静到动的图景，同时在起伏和动静的对比中，各种景物如同生灵一般活现，便自然地蓄发文势，营造出“悲秋”的氛围。张鼐在文末又点评道：“意有余于语，韵有余于议。”^{[18]卷6:41b} 联系文章创作的社会背景，欧阳修在政治斗争中两度遭贬，面对朝廷内外的污浊和国家的日益衰弱却无能为力。故此句点评是将欧文中描写的草木经秋而摧败零落的悲秋景色融入作者内心蓄积已久的深沉苦闷与悲凉，这种愁苦难以为外人道也，只能寄托于对秋天草木和万物的描写中，所以说是“意有余于语”。

由此可见，张鼐在评点古文时注重挖掘文章表达出的真情实感，探寻文章的“古心”。因此张鼐按照“气骨为主”“使用为要”“理者物之质”“文者道之华”的选文理念，将《古文纲目》的选文分为正人立节之文、劳人经济之文、达人观化之文和才人得意之文四大类。这正是可以抵达文章“古心”的创作实践，便于士子效仿和学习。对此，郑天熙在对张鼐性灵文学思潮的考察中，认为“张鼐的‘性灵说’，融合中晚明以来唐顺之、屠隆、李贽、袁宏道等诸家所长，保持性灵无欲清静的本色，以为文学发生的根本动力，却并未忽略从性灵到文本的技术性过程，且重视文学审美价值”^[19]。文学批评理念一般也是文学思想的反映，古文评点可以体现评家的古文思想。郑天熙所提出的张鼐从性灵到文本的文学创作的技术性过程，在教授士子时文写作的《古文纲目》中有显

著的体现。

四、科考语境与明中后期士风影响下古文选评本的评点倾向

明中后期唐宋八大家古文评点中出现的义理与心性杂糅的姿态与当时的思想文化语境密切相关。我们亦可从明中后期古文评点的载体——古文选评本的编撰宗旨中探讨这种评点特征背后的动机。

科考的实际需求是明中后期古文编选者选评唐宋八大家古文的主要原因。但是在明中后期的不同历史时段上，这种科考需求的指向又有显著差异。在明嘉靖、万历时期，古文选评本以地方官刻本为多，其编撰宗旨是为了课士，推动地方教育以配合国家官学教育体系。相应地，文法类点评也就成了评家的主要的评点倾向。同时，由于古文选评本的编选者多为国家官员和传统士大夫，他们将古文视为阐发伦理道德和政治事功的载体，希冀通过择选和评点古文来领会“六经”经典。如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天曹郎王三省在其编选的《古文类选》序中强调“古人学有本原，六经、子、史，其原也。宪章取材，养之既充，而发之也不苟，故以之名世，以之华国，至于今不废也”^{[20]卷首}。他阐述了六经、诸子和史书作为古人治学的根本来源，培育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道德理想。明万历三年（1575年），嘉靖进士胡汝嘉据真德秀《文章正宗》“去繁就简”所编选的《文章正宗钞》，其编选目的就是“诂圣经而接道脉”^{[3]卷首：袁贞吉《序》}，并强调“文章道德本出一原，文存，道亦存也”^{[3]卷首：袁贞吉《序》}，从同源角度，将“文”与“道”联系得更为紧密。明嘉靖进士、万历年间大同巡抚刘祐为课子所编的《文章正论》，也极为推崇《文章正宗》，称之为“崇雅黜浮，惟庶近道”^{[21]425}。这种重道观念引导着《文章正论》的选文编排。刘祐言：“以经序冠诸首，其发明圣道使受读者即知经旨，譬之饮水知源也。次之诸家虽体格不同，惟明义理切世用。”^{[21]425} 嘉、万时期古文选评本的编选者已经将学习“六经”所蕴含的圣贤之“意”看成是写文章的根本路径，而这可从对古文的阅读和取法中探寻。可见，这一时期对古文统绪的重视和作文技法示范性的构建是基于精英阶层的视角来铺展的。

一方面，明代的科举考试能够引导书籍出版和士子的阅读活动。明嘉靖、万历时期这些在地

方官授意下编刻的服务于士子课士的古文选评本潜藏着的商业价值也引起了书坊主的关注。从明代中后期开始,举业类古文选评本的编刻与出版层出不穷。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名家评点聚集在文本中,如明末刻本《合诸名家选定旁训古文定本》五卷和《合诸名家点评古文鸿藻》十二卷中唐宋八大家文的评家就多达五十位。尽管已有学者指出这种集评现象存在伪托名家评点的情况,是书坊主谋利的主要手段^[2],但是这也充分证实了集评已经成为明代中后期兴起的一种评点本的编辑与出版形式,为各类评点的汇集提供了载体。另一方面,明中后期的文化氛围较为开放和多元,唐顺之的“本色论”、李贽的“童心说”以及公安派和竟陵派的性灵文学思想都在这一时期产生或兴盛,他们对表现“真我”和文学审美性的标举与七子复古派形成抗衡姿态。为了宣传革新主张,树立旗帜以及矫革复古派的拟古之弊,他们利用评点对唐宋诗文进行了重新审视和批评。万历七年(1579年),唐宋派的中坚人物茅坤编选《唐宋八大家文钞》,确立了以“唐宋八大家”古文为核心的唐宋文统观,同时茅坤在评点八大家古文上,开始注重“法”与“情”的统一。在茅坤评语中,有时会出现“情哀词迫”“情事如画”“世情特透”“文情袅娜百折”“无限情思”“深入人情”等字样,它们或是指人的情感,或是指事物情态,或是指世态人情,都是对茅坤“万物之情,各有其至”^[22]¹⁹⁵之说的阐发,体现了茅坤对作家情感世界的关注。此后,唐顺之对“以有法为无法”的文论境界的追寻和公安派、竟陵派文人对性灵思想的关注,在他们对唐宋八大家古文的点评中有所体现。尤其在万历后期的古文集评本中,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文法、义理评点和表达真我精神的评点汇集在同一集评本中,成为明中后期古文评点的独特景观。

美国汉学家浦安迪(Andrew H. Plaks)一直致力于中国古代经典的研究,并强调“透过评注理解中国古代思想文化”^[23]。古文评点是古文阅读过程的生动记录,也是文本意义扩容和文化增值的重要方式,它对于还原文化语境和历史现场具有重要价值。本文对唐宋八大家古文评点的探讨是在明中后期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和古文集评本的范围内进行的,因此评点的集中展示在给读者提供阅读方便的同时,更加具有揭示评点意旨、评

点特色、评点见解等批评理论价值。

明嘉靖、万历时期官刻古文选本的编撰是在国家官学教育机制引导下地方官员自发的文化行为,弘道以文和注重规矩法度就成了他们选文和评点的首要宗旨,这也是他们编刻的古文选本中辑录有较多南宋理学家评语、注重阐述南宋评家意图、传递理道观念的原因。明中后期文坛流派林立,崇尚各异,阳明心学盛行,王慎中、唐顺之、茅坤、李贽、三袁、焦竑、张鼐、陈继儒等明中后期文人无不沾溉其中,他们既重视对心性道德的追求,又强调文采、文势、文境等的独特价值,这些在阳明心学影响下的唐顺之“本色论”和公安派“性灵说”等文学批评理论中得以生发,并在明中后期古文集评本的评点中得到生动展现。总之,文人通过评点对古文进行义理与心性、意趣与法度的深度探寻是苦心向外求索和内在心性体悟二者的结合,这既是在明中后期文坛语境下的文化行为,又反映了评家的古文思想和评点理念。

参考文献:

- [1] 孙琴安. 中国评点文学史[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9.
- [2] 曾绍皇. 试论明清时期文学名著的“集评”现象[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2(5).
- [3] 胡汝嘉. 文章正宗钞: 第四卷[M].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图书馆藏明万历三年(1575年)刻本.
- [4] 吕祖谦. 吕祖谦全集: 第二册[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8.
- [5] 张伯行. 续近思录[M] // 王云五. 丛书集成初编: 第634册.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35.
- [6] 周应龙编注. 文髓: 第九卷[M]. 江西省图书馆藏明宣德三年(1428年)周歧凤刊本.
- [7] 侯体健. 南宋评点选本《古文标准》考论[J]. 鲁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5).
- [8] 李由. 理学思潮中古文标准的重构——以南宋佚书《教斋古文标准》为中心[J]. 古代文学理论研究, 2019(1).
- [9] 左东岭. 明代文学思想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 [10] 唐顺之. 唐顺之集[M]. 马美信, 黄毅, 点校.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4.
- [11] 孙彦. 从《文编》看唐顺之的文法说[J].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 2013(4).
- [12] 左东岭. 王学与中晚明士人心态[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 [13] 唐顺之. 文编: 第六十四卷[M]. 日本内阁文库公

文书馆藏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胡帛刻本。

[14]刘尊举.从观念到文本:唐顺之古文与八股文的文体互动[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

[15]姜荣刚.明代心学与“本色”论的新发展[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6).

[16]黄卓越.明中后期文学思想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17]袁宏道.袁宏道集笺校[M].钱伯城,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18]张鼐.张侗初先生评选古文纲目:第八卷[M].陶嘉社,陶原焱,参订.李元珍,校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

图书馆藏明天启六年(1626年)刻本。

[19]郑天熙.晚明张鼐的学术思想与文学思想[J].文化与诗学,2021(1).

[20]王三省.古文类选:第十六卷[M].日本公文书馆藏明嘉靖十五年(1536年)相州清慎堂刊本。

[21]刘祐选.文章正论:第二十卷[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309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首都图书馆藏明万历十九年(1591年)徐图扬州官署刻本。

[22]茅坤.与蔡白石太守论文书[M]//茅坤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

[23]浦安迪.通过评注理解中国古代思想文化[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10-30(4).

Entanglement of Righteousness and Mind: Critical Ideas of the Critics of the Ancient Texts of the Eight Great Prose Masters During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in the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

WANG Tiantian

School of Literature,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730000, China

Abstract: Classical Chinese textual criticism reflects the critics' views on ancient prose. During the Jiajing and Wanli periods, most of the ancient texts were compiled by local officials for the scholars, and the ancient texts of the Eight Great Prose Masters during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were commented 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opagation and essay writing skills. This is inherited from the comments of the neo-confucianists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and at the same time, more attention is paid to expounding the critics' intentions and conveying the concept of their argumentations. With the rise of Yangming's philosophy of the mind, literary ideas such as Tang Shunzhi's "essence theory", the Gong'an School's "spiritual intuition theory" flourished in the middle and late Ming literary circle, and the criticism tended to explore the minds and emotions of the texts of the Eight Great Prose Masters during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In compiling and publishing anthologies of ancient texts, bookstores often brought together the two types of commentaries of "righteousness" and "mind" to form a collective commentary phenomenon, so as to increase sales points and profits. The co-existence of the two types of commentaries on righteousness and mind in the anthologies of the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 on the texts of the Eight Great Prose Masters during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can not only reflect the diverse ancient literary ideas of the late Ming literati, but also reflect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books for the imperial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Key words: middle and late Ming Dynasty; imperial examination; commentaries on the ancient texts of the Eight Great Prose Masters during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righteousness; mind

(责任编辑 合壹;实习编辑 冯静)